

凯恩斯革命的内涵与真谛^{*}

刘 涤 源

凯恩斯“革命”是在30年代空前严重的经济大危机、西方经济极度危难的时代背景中应运而生的。它在西方经济思想领域中实现了两大转变：一是在经济危机的病因诊断上，由外因论向内因论转变；二是在西方经济营运机制上，由自由经营论向政府干预论转变。它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中确是一个重大突破，标志着一个新的里程碑。

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体系和政策措施是否属于革命性的变革？这个评价问题，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所持见解殊不一致。它的对立学派，如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根本反对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论这种经济思潮，当然不会承认凯恩斯主义具有革命性的学术造诣。凯恩斯主义的门徒们对之备加信奉，对凯恩斯革命确认不疑。此外，还有一些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此持保留的赞同态度。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剖析的问题。本文主旨在于，从西方经济危机理论发展史和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两个角度，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态度，分别对凯恩斯革命的内涵与真谛这个问题进行比较细致深入、明辨是非的评议。

这一评议应力求做到，对凯恩斯在西方经济危机理论史和西方经济学说史中的历史地位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不论是褒是贬都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因此，本文除重点剖析凯恩斯革命的真谛：在理论和政策上的相对优势和重大缺陷外，还须先简要论述它所以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时代背景：30年代西方经济的极端险恶困境

凯恩斯主义是在30年代西方经济极度危难的独特背景中脱颖而出的。因此，必须先对当时西方经济极端危险的窘境、传统经济理论之可怜的混乱状态、以及美国胡佛总统与罗斯福总统应付危难局势在对策上的差异和利弊得失，简要加以论述，才能衬托出凯恩斯革命应运

* 本文是为傅殷才教授主编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书写的前言。该书即将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本文经作者作了某些修改，现发表在此。——编者

而生的时代迫切要求和重要理论意义。

(一) 30年代经济大危机：西方经济濒临“全面毁灭”险境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的产物。这次大危机是资本主义危机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它导致西方经济学说的一次重大的转化:原来占统治地位、以市场自由经营论为中心内容的新古典经济学说顿形衰落,转换为以政府干预论为主导的罗斯福“新政”,随之涌现出凯恩斯“革命”,逐渐成为风靡西方各国的主导经济学说。

自从英国1825年首次爆发经济危机以后,经济危机这种社会瘟疫在经常地、继续不断地按繁荣—恐慌—萧条—复苏而转趋繁荣的顺序,周而复始地循环演进着。19世纪至20世纪初,这大约100年的期间,经济危机大都短暂而温和:一是在深度上不算严重,生产水平倒退通常只1、2年,倒退4—5年以上的情况是很少的。二是在经济危机中,货币金融体系还能正常运行。三是经济危机持续时间较短,生产下降的持续时间不过几个月,10几个月。而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却空前严重而深沉:其一,在深度上,生产水平大幅度下降,贸易空前萎缩,失业人数猛增。1932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比1929年下降1/3以上。资本主义国家总失业人数由1000万增至3000万人,加上半失业共达4000—5000万人;在美国,这期间内失业、半失业由150万人增至1700万人,高达民用劳动力的1/3。他们生活悲苦,惨不忍睹。工人阶级对解雇和失业愤起反抗,罢工风潮和失业示威,此伏彼起,社会危机严重。这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具有极大的破坏力,整整几十年生产力发展的成就付之东流,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倒退到1908—1909年,其中美国倒退到1905—1906年,英国倒退到1897年。其二,这次危机的广度特别广泛,不仅席卷工农业和商业,而且扩展到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制度等领域。资本交易所宣告破产,金融市场也大都猛烈持续爆发挤提存款、抢购黄金风潮,许多银行破产倒闭。第一次大战后恢复过来的金本位制,也在这次危机中再度垮台。这次危机使银行信用系统瘫痪,货币制度崩溃,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史中的第一次。其三,这次危机在时间上持续特别长久,长达5个年头。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史上持续最长的一次世界经济危机。

总之,这次经济危机的极度深刻、持久与广泛,使它具有极大的破坏力。一方面,商品充斥,生产力大量闲置和毁灭;另一方面,却有千百万失业者无工可作,陷入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地。富裕中涌现出极度贫困。这次社会瘟疫特别严重,使资本主义社会陷入“全部毁灭”(凯恩斯原语)的危险境地。

(二) 政府坚信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等待经济复苏

面对这次经济危机的空前严重,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自由放任学说没能经得起考验:在理论上不再能够自圆其说,在政策措施上显得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先从政策措施说起吧。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政府一般都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对周期爆发的经济危机,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来解除的。到垄断资本统治阶段,直到30年代大危机以前,国家对经济危机仍然主要奉行不干预的政策,自由放任的传统理论仍然占统治地位。以美国为例,1929年秋冬间危机爆发后,当时的胡佛总统还是忠于其自由放任传统经济理论,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对策。1931年建立的就业紧急委员会提出一个兴办公共工程的计划,胡佛拒绝予以考虑。胡佛所能同意采取的唯一措施是建立复兴金融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32年,是政府对付危机的主要工具。胡佛认为,只要少数投放得法的紧急贷款,

就可以克服大危机的困难。因此，对该公司加以种种限制：一来限制它所能贷放的金额；二来只准它向银行、铁路和保险公司发放贷款，不准向工业、公共工程或救济事业贷款。国会通过一个要复兴金融公司向州和市政府发放贷款的计划，遭到胡佛否决，理由是这对健全公共财政是一种危害。

胡佛总统救治这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对策方面表现出十分软弱无能，主要是由于他信奉传统的自由放任信条，严格按过去对待经济危机的老办法：依靠市场机制自动调节去恢复均衡，克服经济危机。结果呢？那套传统的老教条在这次大危机面前完全失灵了。这已经成为铁的历史事实。而政策措施是根据经济理论制订的。政策措施所以失灵，应归源于经济理论的错误。这就必须进而考察经济理论方面的时代背景。

（三）传统经济理论陷入可怜的混乱状态

传统自由经营论是以马歇尔的新古典学派自由放任经济学为代表的。它的理论基础有二：一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机理，即市场机制自动调整促使经济趋于均衡的理论。它被进而推演出：市场调节机制的完善性和协调性，把它描绘成十全十美。这一理论直接主宰着西方市场经济思想。二是萨伊定律：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即“供给=需求”，不论供给（生产）高达什么水平，都不愁在市场需求方面没有销路。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据说，由于外在因素的冲击，经济局部或偶然失调，均衡遭到破坏，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均衡就可以得到恢复。在这些机理和定律的基础上，经济危机被认为是从均衡破坏到均衡恢复之间的过渡性衰退。由此，经济危机不会十分严重，也不会持续很久。这样，当经济危机爆发时，根本用不着政府干预，只须主要依靠市场机制作用的自动调节，辅之以温和的信用调节，就会恢复均衡。如果政府要进行干预，非但徒劳无益，而且有损于均衡的正常恢复。因为把经济危机看成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偶然的过渡性失调；失业也被认为在数量上不会太大，在性质上无非是磨擦性失业或自愿性失业，通过市场机制（特别是工资）的调节，失业问题就可得到解决。

这种新古典经济学说对30年代大危机以前的那些比较温和的经济危机，在理论上还算能够勉强作些解释；而面对30年代经济大危机，它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自圆其说了。因此，在这种百年不遇的特大社会瘟疫面前，经济危机是那样深刻、严重、广泛而持久，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说显得严重与经济现实脱节，呈现出一种十分可怜的混乱状态，没能经得起考验而趋于衰败。

（四）罗斯福“新政”：政府干预论应运而生

在美国，1933年3月罗斯福接任总统。当时，在一片萧瑟凄凉的悲惨景状中，美国经济危机夹杂着极端严重的金融危机。人们对整个国家行将崩溃的疑虑和恐惧心理，简直无法形容。罗斯福就任后，抱定坚决果断的勇敢方针，对危难局势积极进行抢救。他在就职后第二天，采取紧急措施处理银行危机：援引战时法令，下令全国银行“休假”，直到国会能采取行动为止。病急乱投药，和平时期援引战时法令，这种做法是否违反宪法等问题，都顾不上考虑了。

罗斯福一进白宫，就请求国会授以“紧急全权”，并宣布执行“新政”。从本质上讲，所谓“新政”，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其目的在于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来克服经济危机，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新政”措施的具体内容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关于货币金融方面的“紧急银行法”、“黄金法”、“存款保险法”等；有关于调节工业的

“全国产业复兴法”；有关于调节农业方面的“农业调整法”等等。

总之，“新政”的要旨在于政府对财政、货币、金融、产业部门等进行干预和调节，企图建立一个没有危机的、卡特化的经济，以限制生产、稳定物价、保障利润、拯救资本主义，摆脱危机。“新政”的推行，对于解救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复苏，减少失业人数，确实收到了一定的“疗效”。当然，它毕竟只是一种治标性的临时应急措施，“疗效”终究有限，不应过分夸大，它更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个不治之症。但罗斯福坚强果敢地援引战时紧急特权，用政府干预的“猛药”去抢救垂危的痼疾“患者”，稳住了当时整个国家惶惶不可终日的危殆局面，挽救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极端严重而不能自拔的颓势，这种功绩却是铁的历史事实。这种采用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去克服危机，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同胡佛总统自由放任政策所表现的那种软弱无能相比，罗斯福用“新政”去对付经济大危机这种紧急困境，确实要强而有力得多。

“新政”毕竟没有一套成体系的理论作为思想基础，同时，应急措施方面也没有系统化而提到政策的高度。这就有待于凯恩斯来弥补这项缺陷了。罗斯福本人并不通晓、也不相信凯恩斯经济学，他推行“反萧条”的新政实验，完全没有受凯恩斯经济学的影响。但是，在另一方面，罗斯福推行这一坚决果敢的抢救方案，正值凯恩斯创建就业一般理论并接近完成的阶段，他对美国这一重大实验性方案的实施，确曾密切注视，而且高度赞扬。凯恩斯在英国呼吁好几年的公共工程理论和政策，此刻在美国由罗斯福总统进行大规模试验，如果行之有效，那就足以证明凯恩斯经济学的正确性。这就无怪乎凯恩斯为新政实验欣喜莫名，赞赏不已。因此，罗斯福新政方案的实施，对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的创建起了先导、借鉴和印证的作用。

二、凯恩斯革命：经济危机内因论与经济机制政府干预论

30年代经济大危机期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惶惶不可终日，陷于极端危急的悲惨境界。凯恩斯本着对大英帝国（后来是大英联邦）、乃至资本主义制度的无限忠诚和衷心拥护，勇敢坚强地迎接当时那场空前严酷的挑战。他以罗斯福“新政”为先导，1936年出版了其代表作《就业通论》，就是这一剧烈反应的独特成果。治重病，用猛药。在资本主义和平时期经济体制的框架内，《就业通论》型需求管理方案的剧烈凶猛确实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它动用了财政赤字政策那种强有力的杠杆，对经济积极进行干预和调节，以达到并保持充分就业为战略目标，不仅背离了自由放任经济学的传统教义，而且也改变了他前两个货币调节方案（即1923年的《货币改革论》和1930年的《货币论》）的温和格调。这个剧烈的救治方案，从其整个体系来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确实是一个重大突破。《就业通论》出版以后，凯恩斯经济学说在西方各国经济学界逐渐趋于兴盛，进而达到高潮。他的信徒们对“凯恩斯革命”歌颂备至，甚至把它比作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的革命。对待这种崇奉，我们应以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态度，就“革命”的实质内涵作出明辨是非、客观而公允的评价。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经济学说领域内的革命有着本质不同的两种范畴。经济学说属于意识形态，是有着鲜明的阶级性的。两种革命：一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范畴，如马克思的《资本论》；二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如“斯密革命”、“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两种范

畴的实质内涵不同，不能混淆。

《资本论》是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以剩余价值论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它对资本主义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从而揭示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并指出了工人阶级所担负的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历史使命。恩格斯为《资本论》第1卷出版而写的书评中指出：“自地球上有了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阶级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①。它用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了工人阶级的头脑。从此，工人运动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到结合，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马克思《资本论》的主旨在于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属于制度（system）范畴的革命。

凯恩斯《就业通论》的主旨在于以30年代西方世界大经济危机为时代背景，倡导政府干预论新经济思潮，编制以赤字财政政策为主轴的需求管理方案，实行强劲有力的政府干预和调节，抢救陷于极端危殆困境而不能自拔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企图进而长期消除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社会永葆尽善尽美的“乐观世界”。这绝对不是如马克思那样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那种范畴的革命，而是要把垂危中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营运体制的重大改革，抢救过来，并使之永葆青春。这是属于资本主义制度这种框架内在体制（Institution）范畴上的“革命”，与“斯密革命”、“边际革命”属于同一范畴。

总之，上述两种范畴的革命彼此性质不同，不容混淆。关于这点，我们不能有半点含糊。但是，在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长河中，对确实具有改弦更张的内容和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那样一种新学说，把它称之为“某某革命”，如“斯密革命”，那也未必不可。近来有人把“凯恩斯革命”与“斯密革命”、“边际革命”三者并列，称之为近代西方经济学说史中的三大革命，既然明确地界定了属于“西方”范畴，那就不致引起误解。

其次，凯恩斯创建的就业一般理论，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发展史中，他是从外因论转向内因论的首倡者；另一方面，在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中，他是从自由经营论旧经济思潮转向政府干预论新经济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经济学说对西方经济的营运机制在理论塑造与政策筹措方面确实是一种改弦更张性的重大变革，影响巨大而深远，在西方近代经济学说发展进程中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凯恩斯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中确实堪称一代宗师。现在，我从上述两个角度对凯恩斯革命的内涵与真谛进行明细分析。当然，两者在内容上难免有些交错和重叠，但我认为，在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中，凯恩斯在这两方面的重大突破，确实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历史地位。两者应当分别进行评价，才能显示其各自的学术业绩。因此，必须从这两个角度对凯恩斯革命的重要内涵分别加以论述。

（一）经济危机病因探索的重大突破

凯恩斯是受到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猛烈冲击而奋起探究经济发展的障碍何在、以及如何解救这个中心问题而创建其就业一般理论的。换句话说，他以30年代大经济危机为背景，研究何种因素决定总生产量和国民收入这个实际问题，并对失业严重、“富裕中的贫困”的矛盾现象作出解释，并寻求解救对策。他明确承认，他的这一理论是关于“经济繁荣内部何以会孕育着使其自身趋于毁灭的种子”（My theory of why booms carry within them the seeds of their own destruction）的理论^②。在经济危机这个严重病症的病症洞察和病源探索方面同传统经济学说相比，他有着如下一些确具突破性的新观点和新见解：

其一,传统经济学根据萨伊定律:“供给=需求”,根本否认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而凯恩斯则明确承认经济危机确实存在,并且坦率地确认:经济危机已经严重到了使现行社会濒临“全面毁灭”的极端危险境界。

其二,在这种病症的性质上,传统经济学根据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机理,认为这是局部失衡的、由均衡失调而趋于均衡的暂时现象;它坚信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完善性和协调性,可以自动调节而使经济运行重新恢复正常;于是主张自由放任,消极等待,反对政府干预。而凯恩斯则根本不相信市场机制的完善性和协调性,确认经济危机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而恢复均衡,因而坚决主张:采用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对严重而深沉的危机进行紧急抢救。

其三,在经济危机的病因探索方面,由传统的“外因论”转向“内因论”,这是西方经济危机理论史中的一次重大突破。如果说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中,最规则有序的经济现象,要算经济危机和周期波动;而另一方面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中,正好相反,最混淆不清、议论纷纭的却是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可以说,那些经济学家们凡是坚持古典——新古典传统经济学越彻底,其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就越肤浅庸俗。他们大都坚持外因论,从外部因素去寻找经济危机的原因:有的归因于太阳黑子的周期变化而影响气象;有的归因于心理因素:乐观情绪与悲观情绪的交替变化;有的特别强调技术创新对经济运行的冲击;还有的归因于工会、战争、政府干预对经济进程的干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经济危机的根源或原因方面,凯恩斯的研究重点从外因论寻求有规律的外部冲突,进而转移到内因论寻求经济不稳定的内在结构,解释“繁荣内部何以孕育着使其自身趋于毁灭的种子”,即经济高涨何以必然会要转趋萧条的内在因素。他确认“有效需求不足”为痼疾的中心病象,从考察生产、就业和收入的决定因素入手,编制有效需求原理以及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三个基本心理规律,进而分析消费与投资两方面有效需求不足的内在结构。这样,包含在就业一般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统一的综合性内因型经济危机理论,由凯恩斯创建出来了。一方面,提供了综合的国民收入决定模型,包括消费、投资、货币、利息、政府等等因素,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均会引起国民收入的变化。因此,它把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家各种外因型经济危机学说所包含的差不多所有的因素,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都纳入这一独特的庞大统一体系之中。另一方面,随着乘数——加速数模型的建立,以及“不确定性”和预期的强调和确认,引起周期波动的内因论和外因论也就可以统一了。

总之,凯恩斯在确切地肯定普遍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周期波动的存在这一前提下,在病因探索问题上,背离了传统的外因论,把研究重点转向内因论,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发展史中的一次重大突破。对这一转向本身应当给予较高的评价。当然,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理论也存在着重大缺陷。其要害问题在于,他根本不承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因而注定他也就根本不可能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相应的分配关系这种关键性机理中去找到内在不稳定性因素。这一根本缺陷导致他有关的另一些重大缺陷:如他硬说通过“可调节的资本主义”能够长此消除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臻于永葆青春的“乐观世界”,显然,这是一种十足幻想。再如他那统一的综合性内因型经济危机理论,内容庞杂,却是属于现象形态的肤浅概括,并未深入到问题的实质核心——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性与生产成果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但是,它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而在经济危机的病因探寻方面,从传统的外因论转向比较具有现实感的内因论,这一转折本身确实

是一项突破，值得加以肯定。

（二）政府干预论新经济思潮的崛起

关于资本主义国民经济营运机制的评估方面，凯恩斯创建的就业一般理论及其政策措施，同传统经济学说相比，确实具有明显的重大变革，他的门徒们歌颂其为凯恩斯“革命”，主要内容如下：

其一，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方式上进行了“革命”：他摒弃传统经济学说把自由放任经济体制歌颂成完美无缺——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完善性和协调性的说教，承认它具有亟待改变的一些重大缺陷，同时又硬说这些是可救治的，并且进一步坚持说，只要按照他的方案把缺陷改变了，资本主义就可以进入尽善尽美的“乐观世界”。这就是说，凯恩斯用他那套新体制下资本主义的“尽善尽美”去革古典——新古典旧体制下资本主义另一种“完美无缺”的命。我们认为，凯恩斯在30年代经济危机的严峻形势下，摒弃自由放任体制，这是适应了现实需要，值得加以肯定；至于实行他所设计的政府干预新体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矛盾能够有所缓解，但这种“疗效”不容夸大，他所沉缅于“乐观世界”的预言，实属虚妄无疑。

其二，基于凯恩斯的洞察力，觉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重大缺陷。这些缺陷都是传统经济学说不曾揭示、甚至设法掩盖的。这是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在评价上的一项重大转变。他承认资本主义有失业和收入极为不均的缺陷，也承认资本主义经济中“富裕中的贫困”这种矛盾现象。承认失业严重，如不加救治，势必引起革命，使现行社会形态陷入全面毁灭。承认除“摩擦失业”与“自愿失业”两种范畴外，创立“非自愿失业”的新范畴，并且确认资本主义有史以来它就经常存在，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通常现象。

其三，在理论上他创建了“需求会创造它自身的供给”的“凯恩斯法则”，革了萨伊定律的命，摒弃“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的传统教条，用“有效需求不足论”取代“有效需求无限论”，并以此为核心，制订“有效需求原理”，进而展开以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的三个基本心理规律为主要骨干的就业一般理论体系。这就使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新经济学大大背离了马歇尔从均衡价格理论体系为核心的传统经济学。从此，西方经济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凯恩斯所确认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之所在。在他的就业一般理论体系中，消费需求不足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尽管他把消费需求不足与投资需求不足并列有效需求不足的两个组成部分，但他明确揭示：有效需求不足归根到底源于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不足最终不过是由于消费需求不足引导出来的派生现象。这样，凯恩斯把消费需求不足确定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他在事实上承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而传统经济学却不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程中有什么障碍和局限性。这就是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体系中确具重大意义的一项理论变革。

其四，在政策上革了传统自由放任体制的命，确认在没有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势必有效需求不足，不能达到充分就业，主张扩大政府机能对经济加强干预，认为这是可以使现行经济制度免于“全面毁灭”的唯一途径。在经济政策的具体运用上，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革了传统的健全财政原则——收支平衡、量入为出、开支力求节约、税收力求其少这种论点的命。在货币方面，提出“半通货膨胀”的价格一般理论去对传统货币数量论进行重大修正，并把原来居首要地位的货币政策退居辅助性的次要地位。

其五，在经济思潮方面发生了“革命”：政府干预论新经济思潮取代了自由经营论旧经济

思潮。作为理论构思的基础和前提,对未来经济势态必须作出估计和确认。在这种估计和确认上也发生了变革:用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去取代了经济环境的确定性,这就用历史观——时间的存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差异去取代宿命论的均衡观。在战略思想上,对经济发展的动向,用深思熟虑、积极规划的政府干预论经济思潮革了因循等待、消极放任的自由经营论旧经济思潮的命。同时,在战略目标上也发生了“革命”:通过政策干预,把达到并保持充分就业、消除经济危机和充分发挥经济潜力作为经济政策的战略目标,这就改变了传统经济学只求保持价格稳定、听任市场自动调节、保持经济均衡的战略目标。

其六,在分析方法上,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研究总就业量、总生产量和国民收入及其变动的的原因,以区别于研究单个商品、单个厂商、单个消费家庭之经济行为的微观经济分析。

综括上面分别从两个角度对“凯恩斯革命”在内涵上的论述,它的实质含义在于:以30年代经济大危机那种极端危殆的紧急局势为时代背景,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迫切需要,从以马歇尔新古典学派自由放任为基本内容的均衡价格分析微观经济学摆脱出来,创建以需求管理的政府干预为中心思想的收入(就业、产量)分析宏观经济学。凯恩斯对于消费者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危机和失业严重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前程的障碍这种弊端,赋予了一种十分独特的重要地位。他确认,基于“ $\Delta C < \Delta Y$ ”这种消费倾向,社会愈富裕,则收入(生产)同消费之间的差距程度愈大,需要用投资去弥补的数额愈大;同时,每次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去弥补这种差距,取得今天的均衡,这就会使明天达到均衡更加困难^①。这样,他探究出了西方经济发展前程的障碍之所在,创建了经济危机内因论,也就把资本主义经济确认为需求制约型,特别是消费需求制约型经济,这就在事实上承认了资本主义经济在生产发展上的局限性。概括起来,再强调指出,凯恩斯革命实现了西方经济思想领域中的两大转变:一是在经济危机病因诊断上,由外因论向内因论转变;二是在经济营运机制上由自由经营论向政府干预论转变。在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中,凯恩斯新经济学确实是一个重大突破。它标志着一个新的里程碑。因此,它对当代西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对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都有着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当然,它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制度,使其免于“全面毁灭”。它的政策方案仅仅是在维系和加强垄断资本统治的大前提下做些修残补缺的剧烈调整措施,只能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发展史中的一个重大变革,确实够不上说成是从理论到政策旨在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场革命。

注 释: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3页。
- ② 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转载于S·E·哈里斯主编《新经济学》,1947年英文版,第182页。
- ③ 凯恩斯:《就业通论》,徐毓柵译,商务印书馆,第91页。

(责任编辑 邹惠卿)